

从系统论的视角看改革开放

杨小军,何淑君^①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系统发生了根本变化,促进了中国社会系统的发展,使社会系统在协同变化探索中形成了新的有序结构,形成了远离平衡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另一个方面启示我们:只有进一步加快和扩大对外开放,坚持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策略;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切实维护经济安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协调好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才能持续、健康、快速地推进和发展。

[关键词] 改革开放; 系统; 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 N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1-0008-03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系统发生了根本变化,促进了中国社会系统的发展,使社会系统在协同变化探索中形成了新的有序结构。而这种有序结构的形成,它是在遵循一定的系统变化条件而形成的科学的系统结构,从而促进了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推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这对于我们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开放是系统变化的前提条件

(一) 开放是系统维持稳定性的前提条件

开放性指交流,相互影响。普利高津的总熵变换公式告诉我们系统的进化和发展何以可能,这一总熵变换公式为:
 $dS = des + dis$

dis 是系统内部混乱性产生的条件,称为熵产生,它为非负量,即 $dis \geq 0$; 而 des 是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而交换来的熵,称为熵交换,它可正可负。当 $des < 0$ 时,系统把产生的熵排入到环境中,相当于从外界引入负熵,如果系统充分开放,从外界引入足够的负熵,使得 $|des| > dis$, 则有 $dS < 0$, 系统的总熵本身就降低了,这也就意味着系统有序程度可以提高,系统实现自组织。可见,系统只有开放,才能从外界引入负熵流,才有可能抵消系统自身熵的增加值,进而使整个系统熵值为负,使系统走向有序结构。系统的孤立和封闭只能导致系统死亡,或者使系统处于完全无序状态。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系统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系统,由于缺乏与外界的交流,固守以阶级斗争为纲,内部不断地发

生着分裂和斗争,文革时期的内乱使社会系统几乎失去了起码的稳定性。这一切说明社会系统也如同其它系统一样,在封闭状态下只能演化成内乱和斗争,而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短暂的调整,中国开始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此时,中国与世界各国有了更多的联系。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学习外国经验进行技术革命的热情,赶上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全国人民迫切的愿望。它推动中国社会系统迅速改变原有的状态,摒弃阶级斗争思路,把全部精力投入经济发展中,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得到调整,社会进入探索远离平衡态的新的稳定有序结构的状态。

(二) 开放是系统动态变化的先决条件

开放是系统具有动态性的先决条件之一,而动态性则是系统随时间变化的特性。“一个具体系统如果不同周围其他系统发生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即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和交换,它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1] 这指的是系统动态性的意义。一个封闭的系统是无法体现系统的相关性原则的,而且也无法形成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输入、输出和反馈。在没有能量输入、输出的情况下,任何系统都是没有办法维持长久的。因此,系统运行状况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取决于系统与环境的互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系统结构开始发生很大变化。首先是广大农村进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伟大实践,改变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政治结构;接着改革向城市推进,工厂进行承包制、利改税、扩大企业自主权等一系列实践,改变了城市的社会结构:私营企业也开始出现。

[收稿日期] 2008-11-06

[基金项目] 湘潭大学博士基金课题“思维方式视域下的科学发展观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杨小军(1975-),男,湖南长沙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长沙环保学院教师。

所有这些都说明:不论是社会的成员、阶层、群体,还是经济运行状况,政治管理状况,都与以前有所不同。随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变化,社会的整体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这是开放导致的结果。

(三)开放是系统在“自组织”过程中进化的条件

普利高津、哈肯、艾根认为复杂性是物质世界自组织运动的产物,坚持以自组织为基本概念揭示复杂性的本质和来源。自组织即是系统自行、自我组织起来的过程或现象。协同学创始人哈肯对自组织下过一个经典定义:“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这里的‘特定’一词是指,那种结构和功能并非外界强加给系统的,而且外界是以非特定的方式作用于系统的。”^[2] 社会系统也是一个不断进行“自组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由低级到高级地变化着,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有序状态是低级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目标不断地调整,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就是“自组织”过程中由低级有序状态向高级有序状态变化的过程。

总之,在开放条件下,社会系统自觉地进行着各种方式的结构调整,而这种调整是与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开放是改革的前提,改革是开放的必然结果,二者互相联系,不可分离,共同构成了社会模式的转换过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应当“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更大,开放的领域更宽,能够在更深层次上保持系统的稳定性和动态性。

二 改革是社会系统协同共变的过程

社会系统是由多种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的巨系统,系统内的各个子系统之间是密切协同的关系,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它要素的相应变化,同样在变化过程中任何一个要素的不变都会使整个系统的变化拖延。改革就是要使社会系统的各个要素都相应地有所变化,形成社会系统的有序结构,推动整个系统功能的发挥。

(一)市场经济的内部协同

协同是系统整体性、相关性的内在表现,是系统实现有序性、稳定性的原因。因此,为推进系统的进化,实现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的优化,使系统达到整体最优状态,这就要求必须协调好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要素与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关系。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在进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之后,农民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经济主体,这样在农村就酝酿着新的生产力,出现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出现要求国有企业的运行状况有所改变,于是国有企业也逐渐变化,从承包制到扩大企业自主权、租赁、转让、股份制等,这说明市场主体之间本身存在着协同关系。市场体系的各个要素之间也存在着协同关系。市场主体的变化要求市场运行制度的配套,以往的计划经济下层层分解指标的方式必然被抛弃,代之以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还要求相应的法律制度的协同,所以市场法制也必须同时建立和健全起来。这样市场主体、市场制度、

市场体系之间互相协调才构成了完整的市场系统。

(二)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协同

人类社会的生产内容分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文化信息的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保证人类社会自身的生存,而文化信息的生产维持人类社会状态的生存。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属于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而精神文明建设则属于文化信息的生产,它本身就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是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步发展的。

市场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经济建设为精神文明提供物质保证,另一方面精神文明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精神文明建设,只有物质资料的追求,就会使整个社会陷入道德败坏,伦理丧失的地步。反之,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同时,对人民群众进行理想、信念和道德教育,则会使整个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从而保证经济建设发展的方向。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

(三)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协同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企业制度、宏观管理、分配、价格、金融、财税、外贸、科技、教育等社会经济运行所有环节的改革。因而,必须系统配套地进行,哪一方面改革的滞后,都会影响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甚至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因此,它要求每一项改革措施之间要相互协调、互相衔接、相互匹配。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是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的。存在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决策高度集中、机构庞大、法制不健全等现象,严重妨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被消耗掉。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4]

三 改革开放是远离平衡态的过程

涨落在自组织中起极为重要的作用,系统通过涨落去触发旧结构的失稳,探寻新结构,即“涨落导致有序”、“涨落决定全局性结果”,涨落是系统产生有序结构的直接诱因。^[5] 从我国的情况来说,就是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

(一)打破了原有的收入分配平衡

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员收入分配差别很小。1978年邓小平把打破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作为一个能够影响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提了出来,他多次强调: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这就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不是绝对平均主义,而是一个从不平衡到新的平衡的过程。

合理拉开差距,既有利于合法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又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它创造了激励机制,克服了奖懒罚优的“大锅饭”政策,也形成了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真正体现出了社会主义本质。

(二)打破了原有的地区平衡政策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均衡发展战略,该发展战略旨在提高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其主要政策是要求沿海发达地区上缴比例较高的财政收入,对中西部人不敷出的地区给以补贴,同时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和布局向中西部倾斜。这种政策对于加强内地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长期下去,以牺牲投资效益为代价来推动区域间的生产力布局调整,忽视了经济发展和区域生产力布局的效率原则,使沿海地区既有工业基础的经济效能不能充分发挥,延缓了全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我们的区域发展应遵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和利用东部沿海区域的区位优势和技术优势,让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先发展起来,通过它们来支持和带动其它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最后达到区域产业和地区的全面发展。

(三)推动了社会系统涨落的形成

打破收入平衡和地区发展平衡后,社会系统远离平衡态,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增大,地区优势得到发挥,激励机制形成,社会系统内部的涨落也随之增大,社会系统在这种随机涨落中探索着新的社会结构。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探索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被确认,并且稳定下来,成为新的社会有序结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容易形成内部涨落的经济体制,其自由竞争机制本身就激发了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进一步加快,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综合国力进一步加强。

四 几点启示

(一)进一步加快和扩大对外开放,坚持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策略

纯粹的“封闭系统”是不存在的,然而,不同系统的“开放度”却有着大小的不同。系统开放程度大,它就可以从外界引入更多的负熵,保证系统的运动和发展。相反,系统开放程度低,引入的负熵少,系统自身的运动发展就会因缺乏动力而趋于停滞。为此,我国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就要进一步加快和扩大对外开放,更大程度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体系之中。这就要求在考虑国内发展时,必须要有全球视野,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种市场,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拓展开放发展空间,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调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使我国的经济运行适应世界市场的发展。换言之,我们不仅要扩大地域的全面开放,而且更需要扩大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开放,始终坚持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策略。

(二)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切实维护经济安全

由于系统存在非线性的相干作用,系统随机涨落可能通过长期关联而被放大,特别是所谓指数式放大机制,系统中

微小的扰动有可能迅速放大成破坏系统稳定的巨涨落。为此,我们应该在制度建设上下工夫,加强、完善各类涨落机制,通过驾驭涨落机制来促使系统向有序方向发展。对外开放是面双刃剑,特别是随着与国际经济联系的加深,国际上的种种不利因素,诸如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贸易歧视、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国际金融市场的重大动荡等等,这些不利因素的扰动通过系统非线性关联有可能迅速放大成破坏我国经济安全的巨涨落。为此,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切实维护国家安全。一方面,我们既要敢于、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来发展自己,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要清醒认识和及时防范其中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和风险,必须尽快完善监控体系和预警机制,增强抗御风险的应对能力。为此,要在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的基础上,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工作,实现国内经济体制与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相互协调。同时,政府和企业都要加快相关信息渠道的建设和完善,进一步提高对国际经贸形势的观察、分析能力,加快反应速度,提高工作效率,以达到趋利避害和维护经济安全的目的。^[6]

(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好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

系统的协同论告诉我们,要实现系统从无序向有序、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方向发展,就应当注重系统中各要素的相互协调耦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和“五个统筹”的思想。在未来的改革开放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与发展,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同时,要着眼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诸方面相互协调促进,走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 [1] 霍绍周. 系统论[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60.
- [2] [德]H. 哈肯. 信息与自组织[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29.
- [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8.
-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6-177.
- [5] 李曙华. 从系统论到混沌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5-96.
- [6] 张军果.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认真做好“五个统筹”[J]. 经济经纬,2004(4):105-106.